

我的人生故事

海伦·凯勒著

王家湘译

谨将此书献给
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是他教会了聋者说话
并使有听力的耳朵
能够听到从大西洋到落基山的讲话

序 言

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海伦·凯勒小姐孑然一身。这孑然一身意味着她著名的“老师”安·沙利文·梅西和她的几乎是同样著名的后来的助手波利·汤姆森小姐先后去世，留下她孤身一人。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个——或者也许还有随后来的第三个人，又聋又盲的海伦·凯勒怎样能够生存下来。

作为肉体存在的海伦·凯勒在近年中失去了某些活力。老年化的过程给她的精力造成的损害和给我们大家造成的损害是一样的。然而，她的意志力，她的精神力量以及她对别人的鼓舞力仍旧充满着勃勃生机地存在着——也许会在她也必然要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长期存在下去。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她对我们大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证明任何人不论出生或运气如何，都是一个特定的人物。作为一个小孩、一个女人、一个有严重生理缺陷的人——她使人们神往，尽管他们和她不一样，却都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和她的认同感。

凯勒小姐肯定不是孤独的。毫不夸张地说，她每

年得到成千上万的信件、诗歌、奖励、表彰——一条永不停息地流动着赞扬和爱的小河。在日常生活中她也并不是孤独的。她住在康涅狄格州西港城她称之为阿尔康山脊的舒适的家里，她从1936年开始和汤姆森小姐一起在那里工作，直到后者1960年去世为止。她家里的工作人员和临时护士——出于年老多病的需要——都能够通过将手语字母拼写在手心的方法，或者用她本人帮助发展起来并加以示范的所谓的震动法和她交流。她很多的时间都是在休息，在过去两三年里放弃了大部分的写作和所有的公开演讲。她仍旧读很多书，特别喜欢重读年轻时喜爱的作品的盲文版。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她赏花，和宠物狗玩耍，和密友或家人聊天。过去她款待许多客人，从农夫到王侯，现在为了避免劳累，她不得不放弃这一乐趣。

凯勒小姐是在几乎是毕生不停的写作后停笔的。即使在她完成在拉德克里夫学院本科的学习之前，年纪轻轻的在生命的大部分岁月尚未度过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自传。本书是这部先在《女性家庭杂志》连载、后来于1902年出版成书的自传的新版。

在自传出版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安·沙利文在私人和职业生活中一直协助海伦·凯勒。凯勒小姐那时经常说，在严重的身体残疾面前，她在生活中可能取得的不论什么成就其实是属于她的“老师”的，后

来她也不断重复过这样的话。

在今天有许多志愿者和政府机构从事大量的公共教育工作的時候，我们中大多数人意识到，身体或精神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人的数目之大是惊人的。所有的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研究都证明了其实可能是很明显的事情——身体的残疾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上的贫困。然而即使在这方面进行了教育，我们中还是很少有人情理上懂得还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其他的海伦·凯勒们——意思是有些人不仅是全盲或只有部分视力，而且还全聋或听觉很差。

没有人知道在凯勒小姐失去视力和听力的时代，还可能有多少这样的盲聋人。今天，估计至少有四百个学龄儿童——其中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受教育——和大约五千个成年人处于盲聋状态。对他们具有的特殊问题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尽管问题很严重，需要扩大对他们的特殊援助，但是比起19世纪来，盲聋人的生活还是相对正常的。安·沙利文的学生将她个人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老师——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沙利文小姐为今天对盲聋儿童或成人的关注和特殊服务的发展起了铺平道路的作用。

1914年的时候，她们两个人的家中加入了一个新成员波利·汤姆森，一个年轻的苏格兰女子。波利接受过的训练使她能够在安·沙利文·梅西——在此期间她结了婚——于1936年去世后接过作为凯勒小

姐的伴侣和助手的任务。那种训练极其广泛，深刻严格——特别是当这个助手必须在精力和决心上能够和像海伦·凯勒这样的一个人匹敌的时候。

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形容自己毕生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扩展对残疾人，特别是盲人或盲聋人的理解和服务。然而我本人要提出的是，她的名声主要基于她在其他普遍关心的领域中的活动。她和安·沙利文早年时在全国小城镇进行的杂耍式的巡回游说——她们甚至真的做过一阵子巡回杂耍演出——可能向好奇的人显示出一个盲聋的“哑巴”能够思考和说话，而且所思考和所说的关心的话题是相当尖锐和有挑衅性的。她参加了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她的热情和信念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比得上。她因参加反战运动而成为许多人的攻击对象——卷入了一场大争论，因此可能触发了后来认为她过于“左倾”的恶毒无稽的指控。好像这一切还不够似的，她还奋力从事消灭性病的斗争，很可能是在男女都有的场合或在公开讲演中首先说出“梅毒”之类字眼的人之一。

毫无疑问，巡回游说确实包括了提倡盲人教育和康复及培训项目的努力。几十个城市的头面人物听取了她的关于设立或扩大地方志愿组织的援助的请求，州议会议员开会听她有关建立公共支持下的服务的论据。这一切都是作为社会改革运动中的个人斗士在进行的，对她的鼓舞做出后续行动成了十分紧迫的事

情。

一个全国性的志愿机构、当时和今天人们称做美国盲人基金会的组织在 1921 年成立了。它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这个领域里的知识，传播给寻求为盲人居民提供先进的社区服务的人。基金会建立以后不久，凯勒小姐成了这个团体的人数不多的创始领导人小组的一员，此后一直协助发展基金会本身的技术和财务力量。

不管需要出现什么样的过程来承认某些人是“世界公民”，显然海伦·凯勒是符合标准的。她访问并研究过的美国以外的国家可能和别的任何一个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个人一样多。她掌握几国语言，学习语言的能力仅仅是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反映了她对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本能和深刻的尊重。

在她的特殊关怀领域——失明——中，凯勒小姐早在 1915 年就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国际上所做的努力：协助在巴黎建立了一个那时叫做美国盲文出版社的服务性机构，该机构后来并入纽约，成为美国海外盲人基金会，是美国盲人基金会的姐妹组织。

海伦·凯勒——非凡的经验丰富的演员和在公众场合多次出现的老手——于 1961 年 4 月最后一次在重要的公众场合出现。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在华盛顿召开大规模的地区会议，她被邀请参加接受年度人道主

义者奖。顺便提一下，凯勒小姐是这个纯男性组织唯一的荣誉女会员。她按照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的习惯做法接受了这一邀请，目的是能够得到再一次机会为了残疾人的利益对一群重要的人物讲话。

已故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本人对人类福利做出了巨大贡献——邀请凯勒小姐到白宫拜访他。如果记者的反应说明什么问题的话，这次接见是肯尼迪在当年早些时候就职以来最轻松愉快的会见之一。从正式的会见很快变成了最贴切的说法是私人聊天的这个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领导人毫不费劲地建立起了融洽的关系。凯勒小姐用自己的声音足够清楚地说话，总统能够容易地听懂她的话，她对第一夫人和肯尼迪的子女的安好表现出了典型的女性的好奇。总统使自己很快适应了需要通过凯勒小姐同伴的手语字母的传达来和她交流，他说他们都很好，他很遗憾他们那天不在华盛顿，不能和她见面。

不管是不是能够引用总统在这样随便的闲谈中说的话，至少报纸欢天喜地地报道了凯勒小姐的下一句话。她请总统把她的吻带给他的女儿卡罗林。总统丝毫没有失去作为个人和总统的泰然神情，向她热情地保证他会这样做的。

就在要乘汽车从旅馆出发到白宫去之前，一个记者问她见过几个总统。可能只有海伦·凯勒才会说出的回答逗得房间里的一小群人大为开怀，“我没有数

过”。当记者用另外的方式追问，问她记得认识的第一个总统是哪一位时，她想了一下回答说，“格罗夫·克利夫兰”，在场的年纪稍轻的人不免有点肃然起敬。

肯尼迪总统是否把那时八十一岁的海伦·凯勒的吻带给了三岁的卡罗林，这件事从未报道过，但是我们可以怀着一定的信心估计他这样做了。

罗伯特·巴尼特
美国盲人基金会
执行董事

目 录

序言.....	1
我的人生故事.....	1
给我三天光明.....	150
海伦·凯勒书信选.....	167

我的人生故事

第一章

我是带着一种恐惧开始写自己的历史的。可以说，在撩开如一层金色薄雾般笼罩在我的童年生活上的幕幔时，我心中怀着因迷信而生的踌躇。撰写自传是个困难的任务。当我想梳理自己最早的印象时，我发现跨越了将往昔和今天连接起来的岁月，事实和幻想看起来十分相像。成年女人以自己的幻想描绘出了孩提时代的经历。有一些童年的印象栩栩如生地凸现出来，但是“其余的都处在牢狱的阴影之下”。此外，童年的许多欢乐和悲伤已经失去了强烈的感染，我早期教育中的许多至关重要的事件也被忘却在了巨大发现的喜悦之中。因此，为了避免单调乏味，我将尽力在一系列的描述中，只把我感到最为有趣和重要的片段经历呈现在此。

1880年6月27日我出生在亚拉巴马州北部的一个叫做土斯坎比亚的小城中。

父亲的先辈卡斯珀·凯勒是瑞士人，移民来到马里兰州。我的一个瑞士先辈是苏黎世第一位教育人的老师，写了一本关于教育他们的书——真是奇特的巧合；尽管确实贵为王者家族中会有奴隶，贱为奴者家

族中也会有王侯。

我的祖父是卡斯珀·凯勒的儿子，他对亚拉巴马州大片公地“提出了所有权要求”，最后在那儿定居下来。家人告诉我他每年一次骑马从土斯坎比亚到费城去购买种植园所需的物品，我的姑姑还保存着他写给家人的许多信，生动有趣地描述了他的这些旅行。

我的祖母的父亲亚历山大·摩尔是拉斐德侯爵^①的副官之一，她的外祖父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是弗吉尼亚早期的殖民总督。她和罗伯特·李^②还是表亲。

我的父亲亚瑟·凯勒是南方联军中的一个上尉，母亲凯特·亚当斯是他的第二个妻子，比他小很多岁。她的祖父本杰明·亚当斯娶了苏珊娜·古德休，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居住了许多年。他们的儿子查尔斯·亚当斯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后来他搬到了阿肯色州的赫勒纳。内战爆发后，他为南方而战，成了准将。他和露西·海伦·艾弗雷特结婚，露西和爱德华·艾弗雷特^③及基督教神学家爱德华·

① 拉斐德侯爵（1757—1834），法国贵族，曾参加美国革命抗击英军，曾在法国政坛叱咤风云近半个世纪。

② 罗伯特·李（1807—1870），美国内战时期南军著名统帅。

③ 爱德华·艾弗雷特（1794—1865），美国政治家，曾为众议员、马萨诸塞州州长，哈佛大学校长、美国国务卿，1853年进入美国参议院。

艾弗雷特·黑尔^①属于同一个艾弗雷特家族。内战结束后，查尔斯·亚当斯一家迁居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市。

在那场夺去了我的视力和听力的疾病之前，我一直住在一所很小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四方的大房间和一个小房间，仆人睡在小房间里。在南方，人们习惯在家宅附近盖一所附属的小房子，以便偶尔使用。在内战后我父亲就盖了这样一所房子，和我的母亲结婚后，他们就住了进去。房子爬满了青藤、攀缘蔷薇和忍冬，从花园望去像一个凉亭。黄色蔷薇和南方天门冬如一道屏障遮住了小小的门廊。蜂鸟和蜜蜂最爱留连于此。

凯勒家族居住的家宅离我们的蔷薇小舍只有几步之遥。我们的小舍叫“常春藤园”，因为房子和四周的树木及围栏都爬满了美丽的洋常春藤。它那老式的花园是我童年时代的天堂。

即使在我的老师到来之前的日子里，我也总会沿着方正硬挺的黄杨树篱摸索前进，在嗅觉的引导下找到初放的紫罗兰和百合花。在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我也是到那儿去寻找安慰，将炽热的脸埋在清凉的树叶和青草中。沉湎在那个鲜花园中，在一处处地方之间漫步，直到突然来到一条美丽的青藤前，她的叶子和

^① 黑尔（1822—1909），美国牧师、作家。

花朵使我识别出这是爬满了花园尽头那座破败的凉亭的青藤。这是多么地快乐啊！这里还有蔓生的铁线莲，垂悬的素馨，以及稀有的叫做蝴蝶百合的香花，她们娇嫩的花瓣形状像蝴蝶的翅膀。但是蔷薇花——她们是最美丽的。我在北方的温室中从来没有找到过像我南方家中的攀缘蔷薇这样给人以心灵满足的蔷薇花。这些蔷薇花从我们的门廊上像花彩般垂下，使空气中充满了未被任何尘世的气味玷污的清香；在清晨露水浸润后摸上去是这样柔软、这样纯洁，使我禁不住琢磨她们会不会像上帝花园里的长春花。

我生命的开始是简单的，和别的幼小的生命差不多。我来到了世上，我看到了，我征服了，家庭里的第一个孩子总是这样的。给我取名字时有着惯常的大量讨论。家里的第一个孩子不能轻易地取名，大家都强调这一点。父亲建议用他十分尊敬的一个先辈米尔德里德·坎贝尔的名字为我取名，并拒绝参加任何进一步的讨论。母亲说她的愿望是我应该以她母亲的名字命名，这样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母亲做姑娘时的名字是海伦·艾弗雷特。但是在把我抱到教堂去的兴奋中，父亲在路上把名字给忘了，这很自然，因为名字是在他拒绝参与之下决定的。当牧师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只记得决定用外婆的名字给我命名，把她的名字说成了海伦·亚当斯。

我听说在我会走路之前，已经表现出许多迹象，

表明我具有热切和有主意的秉性。看见别人做任何事情都坚持要学样。6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尖声说出“你好”，有一天我清楚地说出“茶，茶，茶”，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即使在我生病以后，我仍记得在几个月大的时候学会的字中的一个，那就是“水”这个字，在丧失了所有其他的说话能力后，我继续发出表示这个字的某种声音。只有在学会了拼写这个字以后我才不再发出“瓦—瓦”^①的声音。

他们告诉我我一周岁那天学的步。母亲刚把我从澡盆里抱出来搂坐在她怀里，我突然被在光滑的地面上闪动的、在阳光下舞动着的树叶的影子所吸引，从母亲怀里出溜下来，几乎是向影子跑了过去。冲动过后，我跌倒了，哭着要她把我抱起来搂住。

这幸福的日子没有延续多久：一个充满知更鸟和模仿鸟悦耳歌声的短暂的春季，一个有丰盛的水果和蔷薇的夏季，一个金黄深红的秋季飞速掠过，在一个渴望快乐的孩子的脚旁留下了她们的礼物。然后，在那阴郁的二月，将我的眼睛和耳朵封闭、把我投入到新生儿的无意识状态的那场疾病向我袭来。他们说是急性胃和大脑充血。医生认为我没救了。然而，一天清早，高烧突然莫名其妙地退了，和袭来时同样突然和莫名其妙。那天早上家里一片欢庆，但是连医生在

^① 英语“水”的发音近似“瓦特尔”。

内，没有人知道我将永远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了。

我想象自己对那场病仍旧有着混乱的记忆。我特别记得在我痛苦不安的清醒时刻，母亲努力抚慰我时的那份慈爱温柔；以及当我在半睡眠状态下辗转反侧后醒来，把干热的眼睛掉向墙壁，避开我一度如此喜爱的亮光，如今一天比一天昏暗时所感到的苦痛和困惑。但是除了这些一闪而过的记忆之外——如果它们确实是记忆的话——一切都显得十分虚幻，犹如一场噩梦。逐渐我习惯了包围着我的死寂和黑暗，忘记了还有过不同的时候，直到她——我的老师——的到来。她将要放飞我的灵魂。但是在我生命的头 19 个月里，我瞥见过宽阔的绿色田野，光亮的天空，树木和花朵。这些是后来的黑暗不可能完全抹掉的。如果我们一旦看到了，“那胜利的一日就属于我们了，还有那一日所显示出的一切。”

第二章

我回忆不起来那场大病以后头几个月里的事情。我只知道自己坐在母亲的怀里，或者在她做家务的时候紧抓着她裙子。我的手感知着每一件东西，觉察每一个活动，以这种方式学会了了解许多事情。很快我感到了和别人进行某种交流的需要，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示意动作。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是”，拉表示“来”，推表示“走”。我想要的是面包吗？那么我就会模仿切片和抹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要母亲晚餐时做冰激凌，就做出操作冰激凌机的动作然后打哆嗦，表示冷。而且母亲成功地使我懂得了大量的意思。她什么时候想要我给她拿东西的时候我总能知道，会跑上楼或者到她示意的别的任何地方去拿给她。确实，在我无尽的长夜中，一切光明和美好的东西都是她充满爱心的智慧给予的。

我了解很多在我周围发生着的事情。5岁时我学会了把从洗衣间拿来的洗干净的衣服叠好收起来，分得清哪些是自己的。我从母亲和姑姑的穿着知道她们什么时候出门，总是会请求和她们一起出去。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总会叫我出来，客人告别的时候我向他们